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学术著作

抗战大后方 金融研究

刘志英 张朝晖等 ● 著

学术著作

抗战大后方 金融研究

刘志英 张朝晖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 / 刘志英、张朝晖等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2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9-07530-9

I. 抗… II. ①刘… III. 抗日战争—后方—金融—研究—中国 IV. ①F83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4384 号

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

KANGZHAN DA HOUFANG JINRONG YANJIU

刘志英 张朝晖 等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苏晓岚

责任校对: 廖应碧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陈永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40mm×1030mm 1/16 印张: 37.25 字数: 570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7530-9

定价: 74.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 振 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 川 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 建 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 德 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 斯 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 汉 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 贵 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 世 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 庭 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 重 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 金 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钺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傅高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 贤 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 本 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 笙 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 心 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 宗 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 宏 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吴 畏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曾维伦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 1937 年冬到 1946 年夏前后将近 9 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 5 年，在铜梁 201 师 603 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 年暮春，我在 57 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

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总序	1
导论	1
一、抗战大后方的概念辨析	1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5
三、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的说明及主要内容	19
抗战大后方金融总论	
第一章 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的史料发掘与利用	29
一、抗战大后方金融档案资料的概况与利用	30
二、民国时期的金融类著作与期刊的概况与利用	40
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中国西部金融业	48
一、清末民初西部地区传统金融业与金融市场	48
二、清末民初西部近代金融事业的起步	60
第三章 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	72
一、战时金融垄断体制的确立	
——大后方金融网构建的制度基础	73

二、全国金融中心的西移	
——大后方金融网构建的基本渠道	78
三、各类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扩充和发展	
——大后方金融网构建的载体	82
四、战时大后方金融网建设的特点	97
第四章 抗战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与作用	106
一、战前重庆作为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	107
二、战时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	114
三、重庆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122
抗战大后方的金融机构	
第五章 抗战时期聚兴诚银行的经营理念与特色	134
一、战前的聚兴诚银行及业务特色	134
二、杨粲三与聚兴诚银行的经营理念	141
三、战时聚兴诚银行的变革	150
四、战时聚兴诚银行的经营特色	164
第六章 四川美丰银行研究	173
一、四川美丰银行的成立与变迁	173
二、四川美丰银行的灵魂——康心如	186
三、四川美丰银行的管理制度	195
四、四川美丰银行的业务经营	209
第七章 抗战时期川盐银行的业务变迁	226
一、战前的川盐银行及其业务特色	226
二、刘航琛与战时川盐银行的业务转型	237
三、战时川盐银行业务变迁的原因	272
四、战时川盐银行业务变迁的启示	301

第八章 抗战大后方的县银行研究——以四川省县银行为例 ...	322
一、县银行的缘起及发展	323
二、县银行的资本与组织	332
三、个案分析：四川省的县银行	340
四、县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良论争	350
第九章 抗战时期的四川省合作金库	359
一、四川省合作金库的兴起与发展	360
二、四川省合作金库的组织机构与人事制度	376
三、四川省合作金库的业务分析	393
四、四川省合作金库之评价	408

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业同业组织

第十章 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	423
一、重庆银行公会与西部金融业的近代化	424
二、抗战前重庆银行公会的作用与意义	437
第十一章 重庆银行公会与《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	454
一、抗战之初《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 颁布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456
二、重庆银行公会在《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 制定与修订中的作用	460

抗战大后方的金融市场

第十二章 近代重庆的证券市场	472
一、抗战前的重庆证券交易所与证券市场	473
二、战时建立后方证券市场的曲折	478

三、近代重庆证券市场与西部经济的发展	486
第十三章 抗战时期重庆保险业研究	496
一、抗战时期重庆保险业的发展	496
二、抗战时期重庆的保险业务	521
三、国民政府对重庆保险业的监管	544
四、对战时重庆保险业发展的思考	549
参考文献	556
后记	578

导 论

一、抗战大后方的概念辨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迅速在占领区建立伪政权“以华治华”;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抗战,出兵华北、华中地区并建立起了敌后根据地。于是中国出现了日伪控制沦陷区、中共领导根据地和国民政府统治区三种不同性质政权并立的局面:一是日本占领区即沦陷区;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还有一种就是国民政府统治区。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统治区又统称为大后方,通常所说的大后方又指未被日本占领的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等地区。^①

“大后方”是那个时代的用语,大致即指西南的川、黔、滇、康、西藏与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外蒙^②各省区而言,此为全民族最后之生命线,此十一省区之中,外蒙已呈独立状态,其余十省区的面积约占全国面积之半。^③在通常的研究中,学界对“战时大后方”这个词,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界定,主要泛

^① 李蓉:《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② “外蒙”即“外蒙古”(英文:Outer Mongolia, Mongolia)相对于“内蒙古”,蒙古国前身。历史上为中国领土。清朝称喀尔喀蒙古,中华民国初,与青海、西藏同为特别行政区划。1921年在苏俄策动和支持下宣布独立,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但遭到当时中国政府严厉谴责,并一直拒绝承认其独立。抗战胜利前夕,为换取苏联出兵中国对日作战,中华民国政府表示允许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③ 陈长蘅:《论战时人口变动与后方建设》,《财政评论》第3卷第1期(1940年1月),第44页。

指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控制的尚未沦陷或成为战场的整个西部地区,含西南、西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青海、新疆等省和湖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一部分。^①

抗战时期的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范畴也有不同的说法:

西南地区:就当时人的理解,“就疆域论,西南一区应包括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七省,但为避免战时威胁,保障建设之安全计,西南之开发似应以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为主要着手之处。”^②

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抗战前的“西南”形成以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粤、湘)为主体范围的区域,整体上体现出西南范围向东部沿海地区延展的趋势。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又存在“大西南”与“小西南”两种划法,且有“西南七省”(川、康^③、滇、黔、桂、湘、粤)、“西南六省”(川、康、滇、黔、桂、湘)、“西南五省”(川、康、滇、黔、桂)“西南四省”(川、康、滇、黔)等诸种说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规划和实践活动以川、康、滇、黔、桂为主。与抗战前相比,抗战以来的“西南”受到国防战略影响,呈现出向内收缩、向西部高地(西康)延展的特点,而粤、湘、桂三省则有一个逐渐脱离“西南”范围的明显变化过程。^④

西北地区:民国时期,时人所谓西北,范围广狭,所指不一,有将外蒙古并入的,亦有认为察哈尔属于西北的,甚至也有认为秦、晋不可分的等等。所含省份,至少4省,最多可达9省之广。从抗战前10年时人的论述看,多指陕西、甘肃、宁夏、绥远、青海、新疆6省。这6省,多地处高原,气候严寒,水源短缺,交通梗阻,但地旷人稀。6省面积共约1080万方里,占全国面积1/3弱,

① 侯德础:《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的开发与衰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99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4页。

③ 根据黄天华《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的研究,西康建省始于1906年清政府筹划川滇边区。1925年北京政府又设立西康特别行政区。1939年1月,经重庆国民政府批准,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府设在康定,下辖金沙江以东33县2设治局及金沙江以西13县。

④ 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4页;张轲风:《大西南与小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主导下的西南空间分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第47页。

而人口仅22588541人,不足全国的5%,可谓人烟稀少。^①

陕西从整个地形看,南部属于秦岭、大巴山和夹在两山之间的汉水谷地,称为陕南山地,北部属于黄土高原地带,称为陕北高原。在陕南山地与陕北高原之间,属于渭河及其支流冲积而形成的渭河平原,它东起潼关,西至宝鸡,南接秦岭,北抵高原,基本形成一个东西狭长的低洼盆地,平均海拔五百米左右,全长三百多公里,这就是所谓关中平原,亦有“八百里秦川”之称。而在抗战时期,陕北高原为共产党所有,而陕南山区与渭河平原为国民政府所控制,属于大后方的地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国人开发西部的呼声日渐高涨,国民政府遂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比较闭塞的北部地区,开始制定开发西北、西南的政策,并着手实施。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与西南一起成为抗日大后方,开发活动达到了高潮,西部因此而获得了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

战时大后方的确立,可以迁都重庆作为标志。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发表,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②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部乘船抵达重庆,部分军政机关留驻武汉办公,指挥对日作战。1938年初,蒋介石明确提出要在平汉、粤汉路以西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将西南、西北作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1938年11月,蒋介石两次重申要“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③可见,迁都重庆,鲜明地树立起长期抗战的大旗,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坚定四万万同胞的抗战意志,有着不可估量

① 张用建:《抗战前10年国人对西北开发问题的认识》,《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95页。

② 蒋介石:《抗战到底》,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88页。

③ 王树荫:《国民党何时确立西南为战略大后方》,《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第76—77页。

的作用。迁都重庆,不但表明了国民党的抗战决心,而且为持久抗战建立了政治中心。

长期以来,虽然涉及抗战大后方史研究的论著甚多,但对其内涵、外延并没有形成共识,主要是从“国统区”的政治性视角或“西南”、“西北”等地域性视角进行研究,而很少将抗战大后方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来进行探讨。潘洵在《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①一文中,对抗战大后方的内涵与外延做了认真的分析,认为,所谓“大后方”或“后方”,是与“前线”、“前方”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专指远离战线的地区,包括后方地域及其区域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建设与发展和对战争的支持、支援力量。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因此,“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便主要是指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战略基地。在抗战时期的文献及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抗战大后方”与“抗战后方”的表述基本同义,“大后方”只是强调其后方地域的广大而已。关于“抗战大后方”和“抗战后方”这两个概念,是何时由何人最先提出,已难以考证。“大后方”比较多地出现在当时的报刊文献中,在国统区正式的官方讲话和文件中,较多使用的是“后方”,而较少使用“大后方”的表述。相反,中国共产党编印的一些文献,则比较多地使用“大后方”的表述。进而,对“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外延,从价值边界、空间边界、时间边界三个方面进行界定。

首先是价值边界。“抗战大后方”或“抗战后方”的核心价值属于国防战略的范畴,是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前线战争的战略基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没有战争,就没有战略后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大后方是与沦陷区、战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战区、沦陷区以外的地区,是战争时期的“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或“民族复兴的基础”。

其次是空间边界。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空间地域众说纷纭,有讲四川为

^① 潘洵:《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11—12页。